

智者樊哙

□晏建怀

秦末汉初那些英雄豪杰之中，樊哙是最奇妙的一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想，樊哙是什么出身？“以屠狗为事”。刘邦举事，他以旧友相随，从军为将，身先士卒，打仗勇猛异常，而且事刘邦一心一意，从无怨二心，可谓忠勇两全。然而，这么一个“狗屠”出身的赳赳武夫，却做过比张良、陈平更加智慧的大事，说过比酈食其、陆贾更加打动人心的辞令，这就不能不让人惊讶而刮目相看了。所以，这里不说他的勇，只谈他的智。

力劝刘邦还军霸上

体现樊哙智慧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他不避斧钺，力劝沉醉于温柔之乡的刘邦“还军霸上”。公元前207年十月，秦王子婴以绳系颈，拜倒于原为秦朝最基层小吏刘邦的青骊马下，曾经辉煌一世的大秦帝国轰然倒塌，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徐徐拉开序幕。然而，创造历史的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，头脑并不是人人都那么清醒，所作的决断，也不是条条都那么科学，刘邦和他手下那些以杀戮开路的悍将便是。进入咸阳，一群莽汉陡然成为了金殿殿的主宰者，鄙陋的性格立即暴露无遗。于是，他们纷纷进入秦朝的府库和后宫，金银、珠宝、美女，他们以胜利者的骄态，抢掠无数。

刘邦呢？按照后来范增评价他“贪于财货，好美姬”的性格特点，自然不能例外于这群哥们儿。果然，他以“官室、帷帐、狗马、重宝、妇女以千数，意欲留居之”，被闪亮的珠玑、惊艳的美女迷乱了眼睛，一进去就再没见出来。在巨大的物质和声色诱惑面前，几乎人人垂涎欲滴，其态如同扑食的饿狼。但是，唯独樊哙和萧何没有，萧何去了丞相府和御史府，他把秦朝律令、图籍拿到了手中，以备不时之需，这是为刘邦，或者说为汉的大业未雨绸缪。樊哙亦是，他尾随刘邦而来，在宫外徘徊一阵后，终于下定决心，直入后宫，从温柔富贵之乡将刘邦拉了起来，急谏道：“沛公欲有天下耶？将为富家翁耶？此间奢丽之物，皆秦所以亡天下，沛公何用为？愿急还霸上，无留宫中。”

樊哙的话，一则体现出他的忧患意识，二则反映出他的智慧，这都是那群草莽英雄所难以具备的潜



鸿门宴上立奇功

质，而且，即便是学富五车的儒生谋臣，也不一定说得这么一针见血：你是想取天下，还是仅仅当个富家翁？刘邦也是醉了，听不进去。樊哙见说不动，急中生智，又拉来了张良，一起说服刘邦，终于让刘邦接受了建议，恋恋不舍地走出秦宫，还军霸上。还军霸上，就是后来项羽拥40万大军而没有进攻刘邦的根本原因，设若刘邦据咸阳、占府库、夺金银、抢美女，以项羽火爆的性格，定然兵戎相见，结局不堪设想，可见樊哙此举功不可没。

力对项王

第二件事，就是鸿门宴上对项羽的一顿义正词严的教训。刘邦到达鸿门，一进入宴会现场，便觉杀气扑面而来；范增频频给项羽使眼色，再三举起玉佩暗示项羽赶快下手，见项羽不睬，又召来项庄，命他借舞剑之由，“击沛公于坐，杀之”。刘邦当时一定如坐针毡，惊恐万状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樊哙“带剑拥盾”而入，头发上指，怒视项羽，项羽亦惊起，按剑而立。当得知他是刘邦的车夫后，禁不住由衷赞叹道：“壮士！”项羽虽有此赞，但霸王的霸道之气却丝毫不敛，“斗卮酒”“生彘肩”，轮番“轰炸”，樊哙立而饮之，拔剑切而啖之，一一领受。项羽意犹未尽，再逼一步：“壮士，能复饮乎？”樊哙应声而答：“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辞！”又一饮而尽。

此时的樊哙，满面红光、满身酒气，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，遂当面向项羽慷慨陈词：“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举，刑人如恐不

胜，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：‘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。’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大王来。故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。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赏，而听细说，欲诛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续耳，窃为大王不取也！”

樊哙这段有理有据、鞭辟入里的外交辞令，如同一篇精彩绝伦的演讲，堪称外交史上的经典。何谓理？秦朝灭亡，皆因严刑酷罚，暴虐成性，百姓水深火热，才纷纷举兵反叛，此为官逼民反的天理；何谓据？怀王作为楚国之王、你项羽拥立的义帝，本与你“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”的约定，如今刘邦先入咸阳，非但没有主动自立为秦王，还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毫毛不取而静待你来分享胜利果实，这样一个劳苦功高的人，你不仅没有封赏，反而要诛杀，赏罚不公、任意杀戮，这难道不是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吗？

听了樊哙这段近乎教训和斥责的辞令，项羽无言以对，连忙请樊哙入座就座。这说明，脾气暴躁如项羽者，都被樊哙这套充满智慧的说辞给征服了。同时，樊哙也用他自己的智慧，为刘邦争取了脱身的时间，救主于不测，使他安然回到了驻地，再立新功。

值得补记的一点是，刘邦借上厕所之名出来后，对张良和樊哙说，未及向项羽辞行，怎么办？樊哙说：“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让。如今人方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何辞为！”这种智慧而富有哲理的话语，不是“谋圣”张良所言，而出自“狗屠”樊哙之口，真真让人诧异，也不得不佩服。而且，樊哙的这个建议，为刘邦的顺利脱险，找

到了道德依据，亦是良计一条。

冒死闯宫

第三件事，则是樊哙“排闼”进谏。何谓排闼？排闼就是未得到允许而撞开门进去，意即闯宫。《史记·樊酈滕灌列传》载，公元前196年，英布反叛时，刘邦旧伤复发，躺在宫中，紧闭宫门，拒见任何人，大臣中连周勃、灌婴等都不敢擅入。樊哙见刘邦躲在深宫10多日，不见大臣，不理朝政，长此以往，将不利于江山社稷，因而冒死排闼。闯入宫中，却见刘邦头枕着一名宦官，兀自横卧床上，如同一个等待死亡的病人。

樊哙见状，立刻痛哭流涕道：“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壮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惫也！且陛下病甚，大臣震恐，不见臣等计事，顾独与一宦者绝乎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？”

樊哙的话，直如箭，苦如药，一般人听了都会刺耳难受，何况面对的是九五至尊的皇帝？但奇怪的是，刘邦不但没有因为这刺耳的话而生气发怒，反而“笑而起”，满脸笑容地爬了起来，接见大臣，处理朝政，可见他对樊哙的话，是真的听进去了，而且认为是有利于自己和国家的药石之言，因而从谏如流。

樊哙闯宫进谏，当是勇者之举。直入深宫，单是窥见了皇帝的私密生活就是死罪一条，但他不管不顾，其勇可嘉；所说之话，亦是智者之言。不见大臣，不理朝政，领导层处于真空状态，于刘氏江山，将十分不利，何况与宦官过于“亲近”，有“阉官乱政”的危险，更是亡国之兆。刘邦之所以“笑而起”，与樊哙话语中的远见和所深含的道理是分不开的，单有冒死的勇气而没有智慧的言语，樊哙当时的遭遇或许截然不同。

梁启超曾评价樊哙说：“若其谏咸阳狗马之爱，纠寝疲倦勤之失，何其明于大体也。”谏刘邦还军霸上、出官理政、舌战项羽这些事情，樊哙确实表现出“内有忧患、外识大体”的远见，但这分析还略嫌不够，因为这些话语所反映出来的，还有樊哙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凡的智慧。



王室后裔睿智的遗托——信托的价值（五）

□车 耳

身患绝症的苏先生本来是满族王室后裔，他的家族本姓完颜，100年前改为汉姓，这完颜的姓氏曾经是八旗子弟中最受尊敬的姓氏。苏先生退休前作为总工程师跑遍大江南北，然而在年近80时，突如其来的癌症打乱了苏先生幸福家庭的平静。和病魔奋争一年后，苏先生自己分析病情，并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手术，以彻底改变平时要随时带着尿管的生活。因为对这个将尊视为生命的长者，长期需要外人料理的生活令其颜面大失，生不如死。当然他也知道手术风险很大，自己完全有在手术中丧生的可能。于是这位曾经的大公司高管和满族王室后裔，以严谨的态度平静地写下自己的遗嘱，并在手术前召集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妻子和所有6个子女到床前当众宣读，还摄影录音以为旁证。

他写的遗嘱简单可行，要点是鉴于老伴年事已高又缺乏独立生活能力，所以将自己所有财产都交给最小的儿子管理，每月从遗产中拿出3000元零花钱给老伴作为外加生活费，住在哪个子女家，钱就给哪个子女。这笔钱再加上老伴自己的退休金，可以确保其生活无虞。遗嘱还规定非特殊情况不可多支付，当然外出旅游或者其他娱乐活动则

实报实销。此外，鉴于子女分布在全国各地，为了鼓励他们尽量多地前来看望母亲，遗嘱强调所有差旅费均从遗产中报销，探望多少次就报销多少次。而这一切开支、报销均由最小的儿子管理，意味着小儿子是其全部财产的受托人并代行遗愿。最后按照满族习俗，遗嘱限定所有开支后，遗产剩余则全部归属众多第三代中唯一的孙子，以保证姓氏和血脉的传承。

遗嘱宣读一个月后，手术失败的苏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然离世，而其高齡妻子多年后仍然健在，还是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。她甚至不愿意接受保姆入户，当然也不想进养老院，只希望尽情享受子女轮流前来陪伴的天伦之乐。而这些子女们也没有辜负老父亲的期望，没有因为遗嘱规定红过脸，没有人觊觎老爷子的遗产，没有纠纷、没有官司，这个遗嘱于是成为一纸文官奠定家族关系长治久安的经典例证。

苏先生在大家庭中长大，自己也按照满族方式建立了一个大家庭，膝下多人多女，于是意识到要在家里建立一种规则，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行为方式。他想到的是伴随自己一生的妻子已经年迈，又是大家闺秀出身，不仅不会做饭，不会收拾房间，不会管理财产，甚至连夫婿究竟有多少共同财产都不清

楚。加上她对别人慷慨，办事花费大手大脚，万一丈夫不在的话，可能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将家产消耗殆尽。假如之后她还在世很久，其生活只有靠为数不多的退休金维持，说不定还得倚仗儿女接济，那个时候就只能指望子女的孝道了。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，也为了避免每个孩子都经道德考验，这位睿智的老人采用了一个符合国情的财产处置方式。

首先，他整理了自己一生创造财富，并排除身后各种能想到的不确定性，在征求了大家意见之后，他在神志最清醒的时候作出最理智的决定。如果在手术之后可能就晚了，而且以他的病弱身躯完全可能下不了手术台。

其次，他选择了幼子，也是能力最强、最有同情心的家族成员，这是一种家族型的托管，一种家族信托。这种家庭内部的信托无需社会认可，无需拥有像信托公司那样的牌照，当然也无需支付昂贵的信托费用，也不用签署各种数不清的法律文件。最重要的是全部财富和其产生的未来收益都掌控在家族手中，未来全部用于自己家族。

再次，他懂得不是从感情上或者道义上进行约束，而是从制度上进行约束，用白纸黑字契约式的方式进行规范。无意中，他在中国现代老年人中开辟了一个新式孝道维

系方式，一种新式家庭组带的先河，使得那些年过半百甚至年过花甲的子女有动力前来看望老母时，至少来一趟不至于损失了自己的资产。

以法律语言说的话，遗嘱是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人处分配，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。遗嘱在国内可以用多种方式制定，口头的或者手写的或者代写的。苏先生所立的是一种自书遗嘱。这种自书遗嘱对书写人的要求是很高的。书写人不仅要具备一定专业上的法律知识，文字表达能力也要好，写得清楚看得明白。因为所谓专业知识并不仅限于遗产继承法律，还散见于我们国家的物权法、婚姻法甚至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条款。一旦书写人在这方面的法律知识不够专业，或是文字表达能力不够清晰，都有可能影响到遗嘱的合法性，从而给未来的执行带来巨大麻烦，甚至引发没完没了的官司。

苏先生宣读遗嘱时还辅有录像和录音，且有多人见证，也符合国内录音遗嘱至少两人以上在场的规定，该想到的都想到了。这份遗嘱给后来两代人带来平静和感恩之心，而家庭平和则是父母的最大心愿，苏先生在天之灵也会为其杰作感到欣慰。

昭襄王时代，范雎入秦，提出远交近攻之策，被视为英明的战略转向。其实，秦国整体方略未变，无论是范雎还是魏冉，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大国均势，尽量争取崛起的空间。没有不带刺的鱼肉，没有一劳永逸的策略，远交近攻只能在合适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。“远交”只是表面现象，也是暂时的，这种交往的本质是制衡甚至暗中削弱对方。秦在昭襄王一朝正是致力于此，并演绎出一个个远邻近攻的精彩故事。

第一张骨牌

“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，政由方伯。”到了秦昭襄王时代，战国最先进的强国魏已经走向衰落，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强盛起来，齐、楚、秦、赵成为新的四强。

赵倾尽全力，在公元前296年攻灭中山国，打开了发展上升的结构性空间。日新强大的赵国牵动各方，尤其齐国原来和中山国关系密切，现在需要直面和赵国的接触甚至碰撞。令诸雄庆幸的是，赵之强国梦止步于内乱，对于昭襄王有恩的赵武灵王丧身沙丘之变。秦少了道义约束，也少了制衡对手，踌躇满志，大举东进。

从昭襄王十三年（公元前294年）开始，秦攻伐韩魏，层层剥笋，有条不紊。韩魏之后，秦面对尚且强大的赵国，需要“帮手”，齐国是最佳选择。昭襄王十九年（公元前288年），秦相魏冉亲自出访齐国，提出了齐、秦“东西致帝”的倡议，实质是试图和齐联手瓜分赵国，就像当年秦齐合作，东西并举，共同削弱了最先崛起的魏国。

反转伐齐

百密终有一疏，秦国出现了少有的战略误判。此时齐国的焦点在宋不在赵。秦得巴蜀而富，赵灭中山而强，齐渴望得到近在咫尺的宋国。如果助秦伐赵，秦得利大于齐，齐、秦两国还会提前相遇。因此，齐容忍赵灭中山，反而转向和赵国合作。齐闵王自去帝号，于公元前287年组织齐、赵、魏、韩、燕五国伐秦，拉出了一记凶猛的“孤圈球”。

犯错不可怕，应对是关键。秦以应变变，一方面退求其安、不与五国联军交锋；另一方面，迅速把之前占领的温、积、高平等地归还魏赵两国，暗催其变。五国各怀私心，无有大成，齐更是利欲熏心，在乱局中浑水摸鱼，居然声东击西，于公元前286年攻灭宋国。

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看似易得厚利往往都是大麻烦。齐突袭灭宋，今天下侧目，独得膏腴之利，实则已经引火烧身，其祸大过赵灭中山。秦敏锐地捕捉到了天赐良机，犹如一位优秀的削球手，不仅化解齐国大招，还很快反转局势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组织联合反齐力量。

秦战如虎狼，更能长袖善舞。公元前285年，秦楚会于宛，秦赵会于中阳，楚、赵既安，秦向齐亮剑，取齐之河东九城。次年，秦魏会于宜阳，秦韩会于新城，燕昭王入赵，拜见赵惠文王。燕国恨齐入骨，得秦赵两强之援，乐为前锋，五国联军正式组成。秦稳坐钓鱼台，四两拨千斤，策动了战国时代最为成功的联合军事行动。齐国强大一时，也难敌众手，遭受秦隔山打牛之击，在看似弱小的燕国面前一溃千里，几乎亡国。

纵横捭阖需要实力，也需要技术。秦将“远交近攻”战略升级至20版本的“远削近攻”，更为务实有效。秦无苦战，但天下已变。齐国衰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，虽经田单复国，但实力大不如前，再也无法和秦一争高下。

神鬼之军

齐、楚同为秦的远方大国，既已弱齐，必要疲楚，于是秦施展“一石二鸟”的双杀计。秦昭襄王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79年），秦赵相会，秦王令赵王鼓瑟，蔺相如逼秦王击缶，秦赵在似乎不太友好的氛围里却达成了“友好”谅解。皆大欢喜的渑池之会后，秦无后顾之忧，专注筹备对楚大战。

在此前一年（公元前280年），秦国宿将司马错领军从陇西入蜀，补充10万生力军和600万斛粮草后，顺江而下，兵出巴蜀，声势浩大，先后占领了楚之黔中、上庸、汉北之地，并

远削齐楚

□崔庆

拿下了关键战略节点郢。为了稳居江汉上游，秦迅速迁徙大量人口充实新得之地，确立了对于楚国的先发优势。

取必两端，攻必两路。正当楚国严阵以待，防备司马错兵团，另一支秦军在郢地悄悄集结，准备沿汉水南下。这是由“战神”白起率领的机动兵团，人数虽仅为数万，但皆是百战精兵，极为凶悍。出征后毁桥焚船，自断归途，一路向南，扫荡楚国江汉之地。此战不同以往，既是歼灭战，也是震慑战，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“驱楚之战”。素来冷酷的白起似乎更加无所顾忌，将战争进行到极致，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郢城。

毁楚宗庙

郢城在郢都之北，素为楚国门户，此城若失，郢都必亡。楚国大军云集在此，寸步不让。面对郢的坚城重兵，白起从容规划，在百里之外筑坝蓄水，修渠引水，以灌郢城。这是一项庞大的土工作业，但效果显著，渠成水到，楚国数十万军民丧生，损失惨重。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由水攻造成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。

秦昭襄王二十九年（公元前278年），白起军团经过短暂休整，乘胜攻破郢都，随后溯长江而上，将楚国历代先王的墓地夷陵焚毁，甚至还向东追击楚军残部，直至汉江西岸的竟陵。“灭人之国，不绝其祀”。战国之乱，烽火连天，但毁人宗庙的做法还是极为罕见的。虽然秦号称“虎狼之国”，但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穷追猛打，火烧夷陵，用意何在？

一石多鸟

白起的冷酷绝非一时兴起，此役秦国的作战意图清晰，是深谋远虑之举。经过此番苦战，“楚襄王兵散，遂不复战，东北徙都于陈”。此后，楚国整体战略重心东移，虽然公元前276年，楚国夺回黔中15城，但对于整体格局没有太大影响。江汉之地成为秦国的“南郡”，白起成为“武安君”。

秦取南郡，毁楚之宗庙，一石多鸟。一是秦出巴蜀，战略天地为之一广；二是宗庙被毁，极大打压了楚国重返江汉的意志；三是五国伐齐之后，齐国孱弱，这时楚国战略重心东移，必将和齐国发生激烈碰撞，齐楚相争，秦可渔翁之利。

六国试图联手制秦，但秦意志坚定，不做消极的应对者，而做积极的主导者。奇正相守，稳中求进，有定势，无定法，秦不放过每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，东方大国齐和南方之强楚不知不觉同时走上“夕阳之路”。掣肘已去，秦专心近攻之谋，蚕食三晋，以图上党之利。

